

主编 方克立

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 实用主义的误读

——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

顾红亮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主编 方克立

**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 **实用主义的误读**

**——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

顾红亮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近现代哲学之影响/  
顾红亮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9  
ISBN 7 -5617 -2323 -7

I . 实... II . 顾... III . ①实用主义-哲学-研究  
②杜威, G. (1859 ~ 1952)-哲学-影响-哲学, 中国  
IV .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8771 号

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 实用主义的误读

——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之影响

著 者 顾红亮

责任编辑 张俊玲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发行部 电话 021 - 62571961

传真 021 - 62860410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11.5

字 数 282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0 年 10 月第一次

印 数 001—3000 本

标准书号 ISBN 7 - 5617 - 2323 - 7/B·135

定 价 19.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 总序

风云激荡的 20 世纪即将成为历史，新的世纪即将来临。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20 世纪“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第三次是改革开放，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这三次历史巨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世纪之交，深入研究百年巨变的丰富内涵和历史进步的本质，系统总结本世纪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各个方面经验和教训，为 21 世纪新的奋进指出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是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重大课题。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共同努力、

分工协作来完成。其中，总结和反思百年中国的精神历程，对 20 世纪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作一番系统的总结、反思和自我批判，是这个大课题中的一个子课题。积极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理论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全部文化又在哲学中得到集中体现。一般来说，哲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变迁是同步的，因此，20 世纪中国的三次历史巨变，自然地也就成为 20 世纪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发展阶段性基本标志。考虑到哲学和思想文化发展还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我们可以大致地把 20 世纪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20 世纪初到“五四”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思想论战是这个时期哲学、文化的重要内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哲学则是这个时期中国哲学的最高成果。第二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个时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三足鼎立、对立互动的局面，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证明了真正代表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不是别的，它就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思想。第三阶段是从建国初到 70 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成为立国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大陆得到广泛传播和普及，推动了各方面事业的发展。但对它的简单化、教条化理解也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和创新。这一时期，在台港地

区,哲学和思想文化发展则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三民主义哲学、天主教的新士林哲学、当代新儒家和各种西方哲学与文化思潮都各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第四阶段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注意与当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相结合,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合理因素来丰富自己,表现出了新的蓬勃的发展生机。这二十年也是海峡两岸以及中外哲学与文化交流互动最活跃的时期。所有这一切,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基本内容,无疑都应该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之内。

我有这么一个看法,在世纪之交以至21世纪初的十年、二十年内,我们固然需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作整体性的宏观审视和研究,弄清基本的学派分野,揭示其发展大势、规律和特点,总结出对后世有益的经验教训。但做好这一工作的前提,是必须对这一百年来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所涉及到的主要人物、著作、思潮、学派、问题、论战等各个方面,有比较全面和具体、深入的了解,掌握基本的思想史实,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因此,相对于整体研究来说,扎实的个案研究可能具有更加基础性的意义。我认为,在目前条件下,要写出一部成熟的、有深度的20世纪中国哲学史或思想文化史来,时机尚不成熟,因为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还没有做过,一些重要的研究空白还需要填补,尤其是关于后五十年的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史,研究基础更加薄弱。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本套丛书不着眼于宏观审视,而是拟就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

化思潮、学派、人物、著作、刊物、社团、问题、学说、论战、事件等一个一个具体课题，展开多层面、多角度的个案研究，力求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研究有一定深度，基本上能把所涉及到的问题讲清楚，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为此，我们初拟了一百多个题目，如能通过大家的努力分工合作做出来，那就为总结 20 世纪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基础性的工作，其价值自然会在新世纪的学术发展中显示出来。

在批判总结工作中，我们还会碰到一个学术立场、观点、方法的歧异问题。事实上，本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当代新儒家都在做 20 世纪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的清理、总结和回顾工作，由于学术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学者们不仅在总体上对前后两个五十年、对后五十年中的“前三十年”和“后二十年”的评价有不同看法，而且在涉及到一些具体人物、著作、思想学说、论争的分析评价时，意见分歧尤大。在世纪之交出现一个批判总结的高潮，“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有思想的对立和交锋，亦可收互动互补之效，这是很自然的正常的现象。本套丛书力图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和方法，来批判总结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积极参与世纪之交的思想互动，为推进中国学术发展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套丛书是在几位中国哲学史界老前辈的指导下，组成了一个主要由国内十个中国哲

学专业博士点中的中青年教授参加的编委会，他们分别联系的作者，大部分是八九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学者。年轻人精力充沛，思想敏锐，富有开拓创新和探索的精神。我们要求各位作者在详尽占有资料、准确理解原著的基础上，用正确的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述，力求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至于学术风格则不强求一律，可以各有特色，各尽其长。毋庸讳言，由于各位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学识水平不同，研究能力和所下的功夫不同，各书的水平也难免参差不齐。我们真诚地希望得到专家、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承担了本套丛书的出版任务，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方克立  
2000年3月5日

## 序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是以胡适和陶行知为重心来考察杜威哲学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影响，是顾红亮博士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我在写这篇序时突然想到：20年前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和20年后我指导的第一篇博士论文有一个共同点，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胡适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由此生出两点感慨：一是对胡适的研究在不断深入。20年前胡适研究还是个有点风险的课题，20年后胡适研究则成了显学。二是20年时光弹指而过，当年冯契先生指导我写论文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如今却轮到我给学生辈的著作写序，可见又一代学术新人正在成长起来。

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一个显著不同之点，是中西哲学的合流。以20世纪来说，中国哲学的两大主流即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显然是中西哲学合流的产物。然而，西方哲学到底对中国近现代哲学产生了哪些影响？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如何评价这些影响等等，都是需要很多人经过深入的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顾红亮的著作试图从一个侧面即杜威实用主

义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影响来考察上述问题。哲学史的研究是史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结合,一方面要广泛收集史料,并对其进行仔细的考辨;另一方面则要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理论概括和创新。应当说,顾红亮的著作在这两方面都是做得比较好的。在前一方面,他不仅收罗了杜威哲学在中国影响的方方面面的资料,而且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梳理,这在这部著作的正文和附录里是不难感受到的。在后一方面,他从实在论、知行论、方法论、群己论、民主论、教育论等六个方面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杜威哲学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多重影响,以及这些影响与时代、传统的关系,多有发前人未发之新论,尤其是后三章。同时,这部著作所运用的思潮研究和人物研究相结合、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相结合、中西比较和古今比较相结合的方法,也是恰当的。因为杜威实用主义曾是五四前后中国的一种哲学思潮,使其发生影响最主要的人物是胡适和陶行知;然而还有些相对次要的人物如张东荪、蒋梦麟、陈鹤琴等,也对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起到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分析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无疑要考察它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同异,考察它与中国近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所进行的变革的关系。

当然,作为学术研究的初步成果,该书不免还有些不完善、不成熟的地方。这些不完善、不成熟的地方,相信作者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会作进一步的改进。

相对于整个西方思想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而言,研

究杜威哲学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影响，是一种个案的研究。由此我想引出一些关于西方思想对中国近现代影响的一般性看法。西方思想影响中国的过程或者说西方思想在中国产生影响力的过程，就其本质而言是中国化过程。所谓的中国化，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就社会层面而言，中国近现代是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西方思想之所以能影响中国，是由于它们总是在某种程度、某个方面满足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大变动的需求。“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语）某一西方思想在中国影响力大小即其中国化的深浅，取决于它满足中国近现代社会大变动的需求的广度和深度。就文化层面而言，西方思想的中国化是指它们在中国取得了新的理论形态，有着与其在西方不尽相同的面貌，如进化论在中国取得了世界观的新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毛泽东思想的新形态；杜威实用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以科学方法论的新形态出现的；而柏格森、尼采等直觉主义、意志主义在中国主要是以非理性主义人生观的新形态出现的。当然，这两个层面是互相关联的：前者制约后者，后者反映前者。

就文化层面而言，在西方思想的中国化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三个有内在联系的环节：变革、融合、制约。

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大变动相适应，被中国人所青睐的基本上是西方的近代思想。因此这些西方思想和中

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时代性差异：前者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后者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形成的。这就决定了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的过程，必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变革的过程。没有这样的变革，西方近代思想是无法在中国显示其影响的。这样的变革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西方近代思想是以文艺复兴为直接背景的。在中国步入近代以前的明清之际，已有着某些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思想胚芽。这就为中国人接受和理解西方近代思想提供了可能性。因而梁启超曾把在西方思想激荡下产生的中国近代思想称作明清之际思想的“复活”。提供了接受和理解西方近代思想的可能性，也就提供了用西方近代思想变革传统文化的可能性。因为只有接受和理解了西方近代思想，才谈得上它对传统文化的变革。

在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变革，是为了使人们认同西方近代思想的观念。对任何外来新的思想观念的认同，实际上是将其或多或少地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否则，外来思想就会被看作是纯粹从外国输入和强加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根基的，从而无法获得认同感。因此，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自觉地融合传统文化。一般来说，两者的融合是以两者具有某种相通性为基础的。西方近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存在着时代性、民族性的差异，但由于两者所要回答的宇宙人生的根本性问题是共同的，因而在对共同问题的回答里总有某些相通之处。这就使得两者

的融合是有可能的。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是在将这两者处于自在状态的相通之处予以自觉地融合的过程中实现的。

变革和融合这两个环节在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变革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否定，同时也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提升；融合是在变革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同时又使变革获得文化上的认同感和亲和力。然而，无论是变革或者融合，是以对西方近代思想理解（把握）为前提的。理解总是在主体的“前理解”即原有观念结构的作用下发生的，而传统文化的观念或意识在主体的原有观念结构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因此，传统文化作为主体的观念结构的组成部分也参与了对西方近代思想的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制约着对西方近代思想的理解，即传统观念或意识渗入到对西方近代思想的理解中去，使其打上传统观念或意识的印记。这种制约作用对主体而言，往往是无意识的，但却是不能忽视的。这是因为这种制约作用通过影响主体对西方近代思想的理解从而影响其对传统文化的变革和融合。所以，传统文化的制约成为西方近代思想中国化过程中，与变革、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又一个环节。

以上只是十分粗略地谈了一些西方思想影响近现代中国的一般性看法。真正地在具体的历史的研究中把这些看法充分地体现出来，把其中的环节深入地揭示出来，则是需要花大力气的。这既是我自己正在努力进行的工作，也是我对本书作者的希望。

陈卫平

2000年7月8日于上海

## 导　　言

本书所指的现代是指 20 世纪初至 1949 年前后。

就杜威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影响而言，涉及面颇广，持续时间较长。本书试图将论域稍作限制，注目于一个现代哲学史现象：在五四时期，实用主义蔚为壮观，一度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种世界观，到三四十年代其影响仍在教育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贺麟曾挑明：“胡适之等所提倡的实验主义，此主义在西洋最初由詹姆士杜威等为倡导人。在五四运动前后十年支配整个中国思想界。尤其是当时的青年思想，直接间接都受此思想的影响，而所谓新文化运动，更是这个思想的高潮。”<sup>[1]</sup>那么，杜威哲学在华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为比较全面昭示杜威哲学影响之广，本书将以问题为论述中心：从问题之维讨论它在参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创造过程中作出了哪些理论贡献？中国哲学家在学习、误读杜威哲学的过程中获得了哪些新的原创性启示？具体而言，抓住几个问题（经验论、知行之辩、科学方法论、个人与社会之辩、民主论、平民教育论），具体辨析和澄清在这几个问题上中国思想家（赞同者、批

评者等)如何解读杜威,指出赞同者在哪些方面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赞同、继承了杜威的观点?又在哪些方面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表现出与杜威的相异,超出了杜威?指出批评者在哪些方面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批判或反对杜威的观点?本书旨在辨别异同。笔者认为,中国思想家在几个问题上对杜威哲学的取舍或误解本身就曲折地反映出它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从广义的文化角度看,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作为一种西方新文化被引入现代中国,在许多方面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从胡适的《中国哲学》(上册)到顾颉刚的《古史辨》,到俞平伯的《红楼梦考证》,到陶行知、陈鹤琴的教育思想都有着实验主义深浅不同的痕迹。它们代表了中国学术、教育史上不同于中世纪的另一个时代。”<sup>[2]</sup>一般而言,胡适和陶行知被看作传播杜威哲学的主要代表,这不仅因为他们是邀请杜威来华讲学的首倡者和杜威演讲的翻译者,<sup>[3]</sup>而且因为他们在杜威哲学中国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阐释杜威哲学时,既忠于杜威文本,又有自我创新。胡适早在1915年的暑假里,就“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sup>[4]</sup>蔡元培曾说胡适之于杜威,“不但临时的介绍如此尽力,而且他平日关于哲学的著作,差不多全用杜威的方法”,所以他“可算是介绍杜威学说上最有力的人”。<sup>[5]</sup>陶行知曾在晓庄师范学校演讲时说,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

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费正清评价说：“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sup>[6]</sup>所以说胡适和陶行知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是杜威哲学影响现代中国哲学的集中体现。本书将以胡适和陶行知为探讨中心，主要剖析胡、陶两人与杜威哲学的关系。

研究杜威哲学之所以能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可以有不同的切入层面。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看，一种外来文化输入像中国这样有悠久传统的国家，产生较深的社会影响，其原因是多重的。从杜威哲学本身看，它内含着科学和民主精神，和当时中国社会的科学与民主的现实需求有相一致之处；从传播的社会力量或主体看，当时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信奉杜威哲学，并利用各种宣传阵地、渠道和手段扩大其影响，还赢得了许多哲学界名流像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支持和赞同，<sup>[7]</sup>形成一股强大的宣传力量；从传统的角度看，经过胡适、陶行知等中国哲学家诠释的杜威哲学既变革传统，又沟通传统，他们找到杜威哲学与传统相结合的一些生长点，加以培植和灌溉，逐步与传统相会通。<sup>[8]</sup>如此等等。本书主要选取杜威哲学与传统的关系（变革与沟通）这个角度来探讨其影响之缘由。当然在个别章节中也从社会需要等角度来补充论述。

“传统”是个涵义含混的概念。它不仅指“本土”或“古典”的东西，而且包括近代传统。这里主要指屡经历史变动仍保持某种同一性的文化元素，“在革故鼎新、消化吐纳的流程中呈现为代代累积、前后相因的文化脉

络”。<sup>[9]</sup>它具有多样性，我们可以选择，它具有开放性，我们可以会通，它具有流动性，我们可以突破。

胡适和陶行知等人带着传统的眼光审视、阅读杜威哲学，既有自觉的层面，又有不自觉的层面。从不自觉之维看，理解总是受着某种前理解结构的制约，带有偏见，合法的偏见是理解活动的前提和出发点。而传统无疑构成了前理解结构的一环。我们与传统总有一种无法割裂的关系。我们处在传统之中，传统也处在我们生活之中。每个人对杜威哲学的理解在不自觉中渗透着传统因素和个性成分，“眼中实见每为心中成见僭夺”。<sup>[10]</sup>从自觉之维看，他们努力阐释杜威哲学和传统之间的变革和沟通关系。在变革过程中，传统被淘洗、过滤了，传统的新生或现代化有了可能；在沟通过程中，传统被激活了，传统的生成成为现实，取得了现代的内容和形式。这包含多重向度：

第一，从范畴看，用杜威的观点对传统的基本范畴、术语进行改造、变革和沟通（如知与行、个人与社会、教育等），说明这些范畴在历史上的本来意义，并赋予新的科学的内涵，使其中蕴藏的深刻智慧显得清晰起来，推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历程。从严复、王国维到冯友兰、金岳霖等哲学家都很重视对传统哲学范畴和术语进行逻辑分析，胡适等学者的清理工作无疑构成其中一个环节。

第二，从内容看，杜威哲学与传统关系有几种表现：  
(1)胡适和陶行知诸人用杜威哲学批判、反思传统，并淘洗、筛选传统，使传统思想激活。“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